

迈向和谐

——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
反思与重构

主 编 黄 平
莫少群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

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
取决于人类自己
但在选择的同时人类也在承担其后果

迈向和谐

——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
反思与重构

主 编 黄 平
莫少群

编写者（以汉语拼音为序）

黄 平
莫少群
徐丽敏
杨 斌
乐国林

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迈向和谐——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反思与重构/黄平,莫少群主编. —天津: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4

ISBN 7-5308-3915-2

I. 迈... II. ①黄...②莫... III. 生活方式—研究—中国—现代

IV. D669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3650 号

责任编辑:宋庆伟

版式设计:王 冬

责任印制:张军利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胡振泰

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(022)23332393

网址:www.tjkjbs.com.cn

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 字数 158 000

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8.00 元

从“中国特色” 走向“小康”与“和谐”(代序)

黄 平

我们有一句老话,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”,这是毛主席说的。但究竟什么叫对人类有较大贡献?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法。1978年改革以后我们说“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”。那什么才叫把中国的事情办好?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连续几年都讲,把中国的事情办好,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这么少的耕地养活了这么多的人。那个时候我在英国,很多英国人不明白这个事,老是问我,你们中国人究竟要吃多少饭?他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,不懂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多么大的事。

现在的问题确实是不一样了,近代以来多少年一直都有饥荒、难民,现在是粮食吃不完、藏不好,

种粮不划算。即使在宁夏、甘肃、内蒙古、云南、贵州,在这些省的贫困县,许多偏远山村的老百姓也藏粮不少,他们已不怎么担心饿肚子、揭不开锅,而是怎么避免藏粮被老鼠吃掉或避免霉掉、烂掉。在正常年景下,吃饭已经基本不是问题,所以说我们不仅是脱贫,甚至也不仅是基本解决了温饱,而是进入了初步的小康。

这就涉及到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。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的发展与改革开放,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,不仅用如此有限的耕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(我们讲“中国特色”,当然可以列出许多,但第一个其实就是“人多地少”),而且在许多领域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。现在的问题是片面追求高增长(例如从技术上说以高投入、高耗能、高污染为代价的增长,或者从结构上看以扩大城乡之间、区域之间、贫富之间的差距为代价的增长),还是在新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走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?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更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,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。

先说小康社会。应该看到,“小康”与我们原来讲的“现代化”是有所不同的。我们过去讲的现代

化基本是指工业化,而工业化又基本是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。在西方近代历史上,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、民族-国家等共同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从制度到观念的东西,即所谓的“现代性”。但是,这绝不只是一个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或技术意义上的现代化过程,而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,它是通过对内建立雇佣劳动与剥削,对外侵略扩张、殖民移民,并把这两个过程都从文化意识形态上加以合法化来完成的。那么如果中国也要搞工业化,还有可能再走这样的道路吗?

英国式的工业化还有一个大问题,那就是:它是第一次以如此大的规模和如此有组织的方式使人远离自然,甚至破坏自然,与自然对立。它把人组织到非自然的环境下,不仅远离自然,而且是把大自然作为掠夺的对象,把大自然,包括森林、矿藏、木材、淡水一直到整个自然的一切生物和动物,作为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源泉,作为征服、战胜的对象,甚至是破坏和消灭的对象。所以,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对内剥削、对外侵略的维度,只讲技术意义上的工业化本身,对我们(不只中国,还包括印度等后发的人口大国)也是很大的挑战,我们有那么多资

源来征服、来挥霍吗？

从文化-意识形态上看，这个把世界日益工业化的过程，是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密切相关的。英国工业革命以来（甚至启蒙以来）最基本的认识模式就是主观/客观、人/自然、文明/愚昧、传统/现代等二元叙述（包括最近很流行的市场/政府、社会/国家这类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）。这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定势或基本框架，说的无非就是如何使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，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。它构成了社会学最基本的叙述框架。但是，这个叙述，实际上是以英国18~19世纪的局部经验为主要依据的，而这个经验所概括出来的东西后来竟然演变成了具有普遍主义（所谓的“普世性”）特征的理论。一切社会，不论他们的自然、地理、文化、历史有什么区别，都必须这么做，借用马克思的话，这给了英国过多的荣誉，也给了它过多的侮辱。

比如中国的整个历史语境就差得很远。中国由于“错过了历史机遇”、高度的资源制约等原因，不仅不可能重复英国式的工业化道路，甚至（更重要地）它也不只是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民族-国家，因为英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-国家实际上是18世

纪以后才形成的。而中国的形成比他们要早得多。因此,“中国问题”其实不只是一个现代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(如怎样实现工业化城市化)。当然,现代性问题在英国也不只是工业化城市化一个维度,它至少包括工业化、资本主义、民族-国家等几个基本维度,但即使如此,也仍然不足以把“中国问题”说清楚,因为我们说的“中国”,是更广大的一片土地,就像欧洲一样,在这里多种经济形态长期并存,而不只是什么简单的转型、转轨的问题;更有甚者,“中国”还拥有一整套古老的(且不同于西方的)文明形态,这个文明里面包括很多种直到现在还活着的文化;中国还是由多个民族、多种文化组成的经济-社会-政治-文化集合体。所以,“中国”不仅在时间上远比现代英国早得多,在内涵上也比英国意义上的民族-国家丰富得多。

但问题在于,我们几乎总是用英国18世纪形成的概念、理论、范式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实践,而当我們这样做的时候,总会不断地遇到矛盾;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,总是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错了。我们很少会去怀疑理论和概念本身(“资本”、“劳动”、“市场”、“国家”等等)是不是有问题或局

限。我们很少会想,用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可能会有什么错。而这些概念、理念,其实是从局部的、很小很特殊的经验里面出来的,但是我们总是不断改变现实来适应这些理论,甚至不惜削足适履。我们有没有想过,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国式的工业化这种方式来组织?这种组织方式再“成功”,也就是在很有限的人群和有限的地域里搞了二三百年的,但是,人类社会有文字的历史已经几千年了,各种文明形态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走下来,有的是消失了,但是有的还在生生不息地变化着、发展着,延续了几千年甚至更长。它们的历史要悠久得多,覆盖的人群要多得多,它能够提供的解释也应该是丰富的,最少有着自己的另外的解释。这样来看,当我们用外来的概念来讲这儿发生的事的时候,是不是就有可能,问题不是出在经验、实践上,而是出在理论、概念上?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再次回到当年《实践论》提出的问题,或者就像歌德“理论是灰色的,生命之树常青”那句老话说的一样,不是实践本身错了,而是理论有问题?更重要的是,也许不是错不错的问题,而是那个滋生理论的经验基础和我们的现实实践差得太远,而这个现实

实践本身其实是完全可以产生出别的理论、别的概念、别的阐释框架的。(事实上已经产生出了这样的理论,那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主义,包括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下建造和谐社会,只不过我们喝多了、喝醉了“洋酒”,反过来嫌它土而不肯承认罢了!)

第二个问题是现代化本身。为什么要提出“小康社会”的概念?“现代化”不就行了吗?对于认识而言,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话语上、概念上、认识上的转换。最早我们是要建设“四个现代化”,那时候现代化是最大的合法性,它要解决晚清以后任人宰割的局面。现在我们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。对“小康”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先建设小康社会(所谓“初级现代化”),初级阶段100年以后就可以是现代化社会(“高级现代化”)了;但是,是不是还可能有一个解释,那就是:“小康”本身就是对“现代化”的替代(alternative)。小康之后(不只是时间之后,也是逻辑之后)也许不是“现代化”,而是别的什么,例如,回到我们的老祖宗的说法,“小康”以后应该是“大同”。

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叙述是,资本主义使生产

力高度发展,但是资本主义也带来贫富差距、剥削、战争,它早晚要被社会主义取代。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,在社会关系里面形成一种和谐(逐渐消灭三大差别)。今天我们谈构建和谐社会这个话题,是“小康”式的和谐,那么“大同”式的和谐是什么?小康的和谐与老式的(英国式的)现代化是什么关系?可以不可以不用那种“工业化”(一方面对内剥削对外侵略,另一方面远离自然破坏自然)的办法来实现小康?还有它与中国老式的和谐(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也是一种小康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更是一种和谐)是什么关系?我们今天说的“小康”,不是简单回到陶渊明的遐想,而是社会主义的小康。无疑社会主义按照它的实质就一定是和谐的,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小康,至少是以合作为基础的,在合作的基础上来构建和谐社会;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,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根据,就是前面提到的,走对内剥削压迫、对外殖民侵略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。同时,回到过去的“黄金时代”也不可能。诗经的时代,或者唐宋的时代,作为社会文化来讲应该也是很辉煌的时代,即使是辉煌的时代我们也回不去了,所以今天不论是讲小康社会还

是讲和谐社会，都是面向未来的。

怎么才能面向未来？首先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我们要从当前的问题说起，一开始也只能是“初级阶段”，而不是提着自己的头发就能飞起来，所以不是简单地“腾飞”不腾飞的问题；其次，要拿自己和别人对照着说（因此要对外开放），但一说对照就有一个以谁为基本参照的问题：是以英国为主线（包括英美或欧美），以那个发展道路为最基本的参照呢，还是其他的社会也可以作为参照？而且，不论如何参照别人，最终还是要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走出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，也就是“中国特色”的道路，所以也不是机械地“接轨”不接轨的问题。

以英国为蓝本的现代性走到今天，二三百年来了，普遍性在世界上被证明了多少？在别的地方被借鉴、被套用成功的究竟有多少？而且，不论在其他地方成功与否，对于类似中国、印度这样的后发的、同时又是古老的人口大国/大陆来说，究竟复制的可能有多大？最后，即使对于英美、欧美来说，老式的发展模式，仅就其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而言，究竟还有多少可持续性？一句话，英国模式的普遍性究竟有多少，本来是在学理层次上被讨论甚至被

置疑的，而我们学界在这方面却做得如此之少！

所以现在提出的“小康社会”、“和谐社会”概念，就如20世纪30年代提出“具体实践”、“延安道路”，改革以来提出“中国特色”、“初级阶段”一样，不应该把它们简单理解为一个政治口号甚至说辞、套话，在学理方面，这本来都是很有内涵也很有得可说的，因为它们都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已有的概念和模式。而且，它们也不只是对现实描述，它们其实也有可能变成分析性的概念，用在我们这儿它们更有阐释力和生命力。

因此，这里有一个很大挑战，究竟我们学界这20多年来在理论上、思想上、学术上有没有拿出分析性、解释性的东西？本来，“小康”、“和谐”这些概念，也可以变成分析性的，再用它们来说中国当下的事，就可能完全有不一样的认识和叙述。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指责中国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而实际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：这里发生的很多鲜活的经验，独特的做法，潜藏着不同类型的发展可能性。如果类似于“初级阶段”、“中国特色”、“小康社会”、“和谐社会”这些概念也变成解释性、分析性的概念的话，再用它们来看我们的经验世界，就可以看出

“中国”可不是那么简单,不是我们简单罗列一些谁都知道的问题(连开出租的小伙子和卖冰棍的老太太都知道的问题)然后就拍脑袋开“大力丸”:大力发展经济,大力解决三农,大力改革开放,大力加快城市化;或者,也不是一看到问题如山就说,我们这不如人家,那不如人家,就只剩下一条出路(比如说英国式的工业化、城市化)可走,“顺之者昌逆之者亡”,为了它我们只好去征服自然,污染也是合理的,拉开差距也是合理的,再糟糕的事情也能被合理化。我觉得中国今天如果把小康、和谐这些概念变成重新认识中国的分析框架,就有可能不是简单重复污染、拉开差距、扩大悬殊,就可能既不自残,也不欺人。你用那么有限的耕地怎么养活了那么多人,一旦真把这个“中国特色”总结出来,用自己的概念、理论真正把它说清楚,就是了不起的学问了。

我们讲“小康社会”“和谐社会”,不是用两个好听的字拿来摆摆弄弄,而是要探索有没有可能重新进入到一个分析的框架里头。当然,说建构和谐社会会有很多现实的依据。新的发展观提出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,要有五个统筹,经济与社会,人与自

然,城与乡,东部与西部,中国的发展与外部世界,不顺就不协调、不和谐。为了建构和谐社会,除了决策上和操作上有很多工作要做外,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,那就是在认知层面上需要做的工作。“小康”也好,“和谐”也好,首先,究竟什么是“社会”?它究竟是个人的简单相加,还是人类的概念、集合的概念?人是合群的动物,它既是生物的、经济的,也是社会的、文化的。也就是说,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把社会简单还原为个人的,更不只是“经济人”,不只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。这里其实无所谓中外、东西,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道理,不但老子、孔子明白,亚当斯密也明白,更别说马克思、布罗代尔了。因此,看一个社会如何,除了看人均收入、人均GDP、人均利润外,还要看社会的互信、亲情、安全、凝聚、秩序等,这是整体上才存在、才有意义的问题,即只有在互相发生关系而组成一个社会(或一群人)时,才有这些东西可言。反过来说,也只是因为有这些东西,人才因此是群居的社会动物,而不是鲁宾逊,马克思说过,鲁宾逊那样是无法生存的。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系、互相关联,才产生一个群、队、社,群与群才发生关联。一

旦把一切还原成个人，其实反而曲解了这个社会的现实。回到中国的现实，如果只用个人的投入-产出、成本-收益是无法解释几百年来江南怎么发展出这么一种文明的，一种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”的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。

如果这样来看全面、协调发展，小康、和谐社会，那么，包含着多种文明形态和多样文化的整个中国，它的人多地少，既是历史制约，也恰好孕育出一种互助的基础，不只是道德上要不要互助，而是客观社会条件，就孕育出了团、队、群、社这样的东西来。以前它叫礼俗社会，伦理为本、家庭为体。这种文明，它的社会观、世界观、天下观是什么？费老讲“差序格局”和“多元一体”，就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的民族国家-现代化工业化概念，也不只是谈理想、对未来的憧憬，而是分析我们怎样可以用“多元”来求“一体”，最后怎样达到“合而不同”，这就是分析和阐释，从这里才可以生发出真正的学术。

阿瑞吉（Giovanni Arrighi）在人民大学出版社的《2004年度学术》上的那篇文章讲中国多少年的发展、多少年的文明，后来事实上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。他（和其他人）认为其实中国的发

展不是得益于什么工业革命(industrial revolution),而是得益于勤劳革命(industrious revolution)。我们没有英国那个工业化,至少没有走向那条道路,为什么没有走上那条道路,客观上可以有很多解释,但是它事实上孕育出了另外一种文明和发达的艺术。是勤劳孕育了中国盛唐以来的经济和市场,但是到了晚清“大分岔”以后,在英国的工业革命面前,勤劳革命的传统似乎就断掉了。于是中国被迫也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。阿瑞吉提出:如果在中国的语境下把自己的勤劳革命传统丢掉,走工业化的道路,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少?比如说你重走帝国主义道路、重走资本主义道路,究竟有多少历史的可能性?中国原来有那么多丰富的传统、经验,在今天是可以完全再生的,因为有基础,中国的文明并没有断掉。他写这篇文章时正好是我们提出新的发展观的时候,他最后提了四点:第一,中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协调发展和谐发展。我们提出新的发展观,五个统筹,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,他认为是前所未有的,至于在实践中遇到什么问题还要时间和实践来解决。第二,中国也前所未有的意识到了环境生态的重要性,但是怎样一方面保持和自然有一个基本